



大国学研究文库



Ancient Literature Research in Perspective of Chinese Classics

国学视野下之 古代文学研究

袁济喜 诸葛忆兵◎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大国学研究文库

Ancient Literature Research in Perspective of Chinese Classics

国学视野下之 古代文学研究

袁济喜

诸葛忆兵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学视野下之古代文学研究 / 袁济喜, 诸葛忆兵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4

(大国学研究文库)

ISBN 978 - 7 - 5161 - 7978 - 9

I. ①国… II. ①袁…②诸…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206. 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74851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史慕鸿
责任校对 石春梅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31
插 页 2
字 数 525 千字
定 价 11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成果受到中国人民大学“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专项经费的支持（项目批准号：15XNLG09）



目 录

《唐诗纪事校笺》掇误	傅璇琮(1)
圣代复元古 大雅振新声	
——李白《古风》(其一)再解读	薛天纬(11)
“正始之音”再解读	袁济喜(22)
汉末魏晋尚“清”及其文艺观念探源	袁济喜(43)
“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	
——木斋先生《古诗十九首》主要作者为曹植说商兑	袁济喜(68)
范仲淹变革思想论	
——兼论与王安石变革之异同	诸葛忆兵(91)
“以诗为词”辨	诸葛忆兵(101)
论唐宋诗差异与科举之关联	诸葛忆兵(116)
论帝王词作与尊体之关系	诸葛忆兵(135)
经纬交织与文体的多元并存格局	
——宋代文体关系新论	谷曙光(149)
“以论为记”与宋代古文革新发微	谷曙光(162)
论中国古代的露布文体及其文学价值	谷曙光(179)
新发现足本《听春新咏》与重新认识清嘉庆北京剧坛	谷曙光(198)
“采诗夜诵”与汉武帝之郊祀礼乐	梁海燕(210)
中唐乐府诗人尚俗思想再思考	梁海燕(223)
梅陶《怨诗行》析论	梁海燕(233)
唐人墓志盖题诗考论	梁海燕(244)
《诗经·唐风·扬之水》新论	吴 洋(259)
从《周颂·敬之》看《周公之琴舞》的性质	吴 洋(268)
上博(八)《鹖鹑》与《诗经·邶风·旄丘》	吴 洋(275)

释“公曰左之”	吴 洋(283)
性别变乱与文学书写	
——隆庆二年山西男子化女事件的叙事研究	李萌昀(290)
舟船空间与古代小说的情节建构	李萌昀(316)
江藩的“儒林正史”	
——传记文学视野下的《汉学师承记》	李萌昀(326)
中国古代叙事诗的乐府传统	辛晓娟(336)
杜甫与高适蜀中关系新论	辛晓娟(353)
杜甫歌行中“悲”与“丽”的审美张力	辛晓娟(366)
明清之际遗民梦想花园的构建及意义	郭文仪(378)
潘飞声《海山词》所见词体现代性转变之尝试与尴尬	郭文仪(396)
清末文人西方书写策略及其地域特征	
——以袁祖志与潘飞声的海外行旅书写为中心	郭文仪(412)
苏轼佚诗辨伪	陈伟文(426)
李清照《金石录后序》质疑	陈伟文(433)
论清初宋诗风的兴起历程	陈伟文(448)
《宾退录》作者赵与峕考	陈伟文(459)
位移动词“去”的词义句法演变机制	华建光(466)
《说文》同音借用类重文疏证	华建光(481)

《唐诗纪事校笺》掇误

傅璇琮

南宋前期计有功编撰的《唐诗纪事》，应是唐诗研究极有文献价值的丰硕之作。其《自序》述其编撰情况，称“寻访三百年间文集、杂记、传记、遗史、碑志、石刻，下至一联一句，传诵口耳，悉搜采缮录”。全书共辑收诗人一千一百五十家，除选录其名篇外，并详辑生平事迹、诗歌评论资料，保存了大量唐代文学史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九五称是集“或录名篇，或记本事，兼详其世系爵里，凡一千一百五十家。唐人诗集不传于世者，多赖是书以存”。正因如此，对后世影响很大，自宋至清，也有多种校刊本。

195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曾出版一部点校本，后于1986年再次修订，重新出版，应是此书首次现代化的整理本。1989年巴蜀书社出版王仲镛先生《唐诗纪事校笺》，对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整理点校本既有肯定，又甚有指摘，认为该书“并不曾认真找出有关唐诗总集、别集或笔记、小说来进行参校”，其记事部分，问题更不少，“其不检原书、标点错误和随意校改之处，亦多”。于是他就广辑史料，着重于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在纪事方面，尽可能找到计氏搜采资料的来源出处，笺证史实”；二是对所载诗篇，尽可能根据有关唐人总集、别集，特别举唐人选唐诗之代表作《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极玄集》等，“加以讎校，讹者正之，缺者补之”。王仲镛先生做了不少工作，其书出版后广被采用，很引起研究者注意。2007年11月，又由中华书局重印。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连续从事于《唐人选唐诗新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唐翰林学士传论》等项目，在编撰过程中不断参阅《唐诗

纪事校笺》(以下简称《校笺》),确受有教益。但在研读中也发现不少问题,随时有所记录,我觉得这部《校笺》中存在的问题也有如王仲镛先生对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指摘之处。我两年前在一高校文学院召开的学术会议上,曾向会议主持者提出,《唐诗纪事》这部极富文献价值之书,搜辑材料既如此丰硕,我们现在确有必要再次做全面的笺证工作;这可作为集体项目,个人之力恐承担不了。该校文学院专家于此正在考虑之中。我现在就已积累的笔录札记,撰为一文,供学界参考。限于篇幅,不能一一细列。(又,文中多次提及《唐诗纪事》者概称《纪事》,提及《唐诗纪事校笺》者概称《校笺》。)

书中有好几处明显的排校错误,如卷六一裴廷裕条,《校笺》在校中有云:“《新唐书》卷五八《宗艺文志》:裴廷裕《东观奏记》三卷。”按《新唐书》之《艺文志》共四卷,即分经、史、子、集,卷五八为《艺文志》之二,即史部,而从未记有“宗艺文志”者,其“宗”字显为衍文,未校出。又如卷三〇司空曙条,《纪事》原文载有《经废宝庆寺》诗,《校笺》对此诗题有校,谓《文苑英华》卷二三六题作《废庆宝寺》。经核,《文苑英华》载司空曙此诗,为卷二三五,非卷二三六。排印之误更明显者,卷二三王颀《元夕观灯》诗(五律),其第六句“场移舞更新”有校,校记数码标为(三),而第八句“说向不来人”又有校,却标为(二),数码次序明显误倒。以上三例,中华书局重印时均未复核改正。

《纪事》所载未误,而《校笺》在笺证中却有明显错误。如卷一九苏源明条,《纪事》记苏源明于天宝十二载守东平郡,与当地官员、文士有宴饮作诗。《校笺》谓《全唐诗》卷二五五于此载有二诗,“题作苏源明《小洞庭洄源亭宴四郡太守诗》及袁广《秋夜小洞庭离宴诗》”。按苏源明确于天宝十二载在东平郡太守任,第二年秋则应召入朝,见《全唐诗》卷二五五苏源明《秋夜小洞庭离宴诗并序》。苏源明为肃宗时翰林学士,有文名,杜甫、韩愈皆有诗文赞颂之。^①《全唐诗》卷二五五所载此二诗,实皆为苏源明所作。《秋夜小洞庭离宴诗》,苏源明有序,谓“源明从东

① 傅璇琮:《唐翰林学士传论·肃宗朝》,辽海出版社2005年版。

平太守征国子司业，须昌外尉袁广载酒于洄源亭，明日遂行，及夜留宴”，乃作此诗。即苏源明于天宝十三载秋离任赴朝，须昌县外尉袁广设宴送之，苏乃作此诗。而《校笺》将《全唐诗》卷二五五所载此诗为袁广作，即未认真核阅。《全唐诗》及今人补编均未载有袁广诗者。

另一例，《纪事》卷六七顾云条，记顾云“咸通中登第，为高骈淮南从事，师铎之乱，退居雪川”。此处所记大致合实。清徐松《登科记考》卷二三僖宗咸通十五年（874），据《永乐大典》引《池州府志》记顾云“咸通十五年进士第”。按咸通十五年于十一月改元乾符，则顾云登第年，确切地当为咸通末，非咸通中。《校笺》未引及，而云：“按《旧唐书》卷一八三《高骈传》：‘广明三年三月，蔡贼过淮口，骈令毕师铎出军御之……’”现经核，《旧唐书》之《高骈传》，为卷一八二，非卷一八三。且《旧传》载“蔡贼过淮口，骈令毕师铎出军御之”，明记为僖宗光启三年（887）三月，为光启，非广明（《资治通鉴》卷二五七所记亦为光启三年）。且广明仅一年（880），广明二年七月改元为中和，则何能云广明三年？此实为《校笺》显误。

《校笺》一书在“前言”中曾提出《纪事》存在一些问题，如弄错史实，差失原意，“或以一人而分为二人，或以两事而合为一事”，认为“若不加以澄清，必将疑误学者”，故尽量予以纠正。但现在书中在纠误中尚有不少遗漏，或误中有误，以上所举为原书未误而《校笺》出现新误，现在再举数例，指出在纠误中仍有疏失。

如《纪事》卷六七韦冰条，载韦冰《三乡》诗一首（七绝），后云：“冰，唐末为鄂令。”即作此《三乡》诗之韦冰，为唐末鄂县令。《校笺》则引《新唐书》卷七四上《宰相世系表》所载“冰，鄂令”，以证实《纪事》所记，未再引其他史事。按《纪事》此卷所记和作《三乡》诗有王视等十人，此乃据唐末范摅《云溪友议》卷中《三乡略》，记有无名氏为《三乡》和作诗所作序，时为武宗会昌二年。按会昌二年为公元842年，确为晚唐，但不能说唐末（唐王朝亡于907年）。《纪事》记为唐末，当并不确切。问题更在于曾任鄂令之韦冰并非作此《三乡》诗者。《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记曾任鄂令之韦冰，实为盛唐时人，非晚唐，更非唐末。《旧唐书》卷一〇五有《韦坚传》，记韦坚于玄宗开元、天宝时历任地方要职，多掌财赋；天宝初为宰相李林甫所忌，连遭贬谪，天宝五载七月又长流岭南临封郡，又云“（韦）坚弟将作少监兰、鄂县令冰、兵部

员外郎芝、坚男河南府户曹谅并远贬”。同年十月，朝中又下令“逐而杀之，诸弟及男谅并死”。《新唐书》卷一三四《韦坚传》亦载韦坚流贬时，其弟冰为鄆令，亦贬谪。据此，则任鄆县令之韦冰为韦坚之弟，天宝前期即受累贬谪而死。《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鄆令韦冰，前有韦兰，后有韦芝，当为兄弟，与《旧传》合。由此可证，和作《三乡》诗者韦冰为晚唐武宗时人，而《纪事》称其为唐末鄆令，误以盛唐玄宗时为鄆令之韦冰乃作此诗者，《校笺》又引《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证实之，则误上加误。

又《纪事》卷二七有房白条，录其《得还字》诗一首（五绝），后云“天宝十三年阳浚侍郎下登第”。《校笺》则仅引《李咄墓志》记阳浚于天宝十三载为礼部侍郎，谓与《纪事》所记合，其他未有笺证，也未考房白事。按《全唐诗》卷二〇九载房白《送萧颖士赴东府得还字》，即此诗，小传谓“天宝中登进士第”，当即本《纪事》。徐松《登科记考》卷九当亦据《纪事》，于天宝十三载登进士第者有房白。按唐时文献，未载有房白者。清劳格、赵钺《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于度支郎中、户部员外郎、祠部员外郎皆有房由，无房白，《唐郎官考》又记载叔伦有《襄州遇房评事由》诗（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卷七）、郎士元《送新偃房由赴朝因寄钱大郎中李十七舍人》诗（《文苑英华》卷二七二）。钱大为钱起，李十七为李纾。可见房由于盛中唐际与当时著名文士多有交往。又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载有房由所撰之《大唐故永王府录事参军卢府君（自省）墓志铭》（《千唐志斋志》八九八），自署“前国子进士房由撰”，天宝十三载闰十一月十一日立。即房由于天宝十三载初进士登第，尚未能入仕，故自署“前国子进士”。当代学者陈尚君、孟二冬之唐登科记考亦有订补，皆据此认为天宝十三载于阳浚下登第者为房由。^①又《全唐文》卷三九五有刘太真《送萧颖士赴东府序》，记萧颖士任职于洛京时，后辈文士乃作诗送之；《全唐诗》卷二〇九载贾邕《送萧颖士赴东府得路字》，同卷所作送行诗者有十二人。由此可见，房由于天宝十三载进士登第后，即与著名诗人如戴叔伦、郎士元、萧颖士等有文字交往。《纪事》所记之房白实为房由之讹，很可能计有功撰写时并非有误，后刊刻时乃形近而讹。《校笺》未充分注意有关文献史料，仍沿其误。

^① 参见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卷九，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版。

又《纪事》卷五九崔元范条，载其诗一首（七绝），未记其诗题，仅云“元范，以监察御史为浙东幕府”，即崔元范原在朝中为监察御史，后又以监察御史任职于浙东幕府。《校笺》于此未有笺文，亦即同意《纪事》所记之“以监察御史为浙东幕府”。按《纪事》此卷在崔元范前记有李讷，谓李讷于大中时为浙东观察使，时崔元范在其幕府，“自府幕赴阙庭”，李讷乃钱送之，并作诗，幕府中亦有人和作，崔元范即亦作此和诗。《全唐诗》卷五六三即载有李讷《命妓盛小丛歌钱崔侍御赴阙》，并有杨知至、卢澹等题之作。又据《会稽掇英集》，李讷确于宣宗大中六年八月至九年九月为浙东观察使。杜牧有《李讷除浙东观察使兼御史中丞制》（《全唐文》卷七四八），杜牧时在朝中任中书舍人，故撰有此制。按李讷钱行及崔元范诗，源于唐范摅《云溪友议》卷上《钱歌序》，中称“时察院崔侍御自府幕而拜，即赴阙庭”，李讷乃钱送之。即崔元范原为浙东幕僚，后朝中任其为监察侍御史，故李讷等作诗送之。如此，则非“以监察御史为浙东幕府”，《纪事》误。侍御史为从六品下（《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一），方镇幕僚不能兼有此较高官品；如杜甫后期在蜀中幕府为左拾遗，左拾遗仅从八品上。

另，《校笺》虽记有《纪事》之误，但未有充分论证者。如《纪事》卷五八霍总条，载其《郡楼望九华》诗一首，后谓“武元衡尝送总诗”，末又云“总，咸通时为池州刺史”。《校笺》云：“按武元衡被盗杀于元和十年（815），去咸通（860—874）约五十年，此言霍总咸通时为池州刺史，当有误。”霍总确非咸通时人，但《校笺》仅云“当有误”，对霍总其人未有论证。按令狐楚《御览诗》收有霍总诗六首（《全唐诗》卷五九七即据载），令狐楚编此书在宪宗元和九年（814）至十二年（817）间^①，由此可确证霍总为中唐时人，故武元衡可有诗送之。又《全唐文》卷七八三有穆员《蝗旱诗序》，谓“甲子岁大旱”，霍总“赋旱蝗诗一章七十有二句”，甚赞赏之，故特为作序。霍总此诗后未存，但穆员谓“甲子岁大旱”，此甲子为德宗兴元元年（784）。又《旧唐书》卷一五五《穆宁传》，记穆宁仕于大历、贞元间，有四子，中有穆员，杜亚为东都留守时，曾辟其为从事。杜亚乃于德宗贞元五年（789）至十二年（796）为东

① 参见傅璇琮编撰《唐人选唐诗新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都留守。^①由上所述，确可考定霍总为德宗、宪宗时人，并可纠正《纪事》所谓“咸通时为池州刺史”之误。

有时《纪事》所载之诗及所记之事，虽未有误，但间有脱略，而《校笺》皆未注出处，不符合笺证体例。如卷六〇崔澹条，《纪事》先录其《赠美人》一诗（七绝），后记云：“大中末，崔铉自平章事镇淮海，杨收为支使，收状云：‘前时里巷，初迎避马之威；今日藩垣，便仰向牛之代。’澹之词也。”《校笺》于此皆未有笺证。经查，《赠美人》一诗，见唐末孙棨《北里志》之《王团儿》条，有记长安北里歌妓之生活环境。至于崔铉、杨收及崔澹事，所谓“杨收为支使，收状云”，文意不清。按此见宋乐史所著《广卓异记》，记崔铉于宣宗大中末为淮南节度使，杨收时在其幕府，为支使；后杨收入朝，累仕侍御史、吏部员外郎，入为翰林学士，经两年，擢迁为宰相，时“铉未移，铉贺收状云：‘前时里巷，初迎避马之威；今日藩垣，便仰向牛之代。’此崔澹之辞”。如此，则《纪事》所谓“杨收为支使，收状云”，文字当有脱略；“收状云”应为“铉贺收状云”，即崔澹此时在崔铉幕府，为其作辞以赞贺杨收拜相。按杨收于懿宗咸通二年（861）四月以吏部员外郎入为翰林学士，四年五月迁为宰相。^②《广卓异记》所记，确可有助于对崔铉向杨收称贺的情况，并可补《纪事》所记之脱略。不过咸通三年冬令狐绹已任为淮南节度使，崔铉移镇襄州（参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卷一二三）。《广卓异记》谓杨收擢迁为相时，崔铉仍“未移”，亦误。《校笺》于此皆未引及有关史料并加证释，确不合体例。

二

《校笺》于校勘《纪事》所载之诗，颇注意于引及今存的几种唐人选唐诗著作，其“前言”中谓“加以雠校，讹者正之，缺者补之”，“要务求其是”，“力求其善”，确花了不少功夫。但遗憾的是，在校勘时不注意同一书的不同版本，引用唐人选唐诗，只举其一种版本，即以此进行所谓补正，不免出现不少问题。

① 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卷四八，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② 傅璇琮：《唐翰林学士传论·懿宗朝》，辽海出版社2007年版。

首先是意想不到的疏失，如《纪事》卷二二李崧条，载有《少年行》三诗，其二“薄暮随天仗”句，《校笺》有校，谓：“暮，《河岳英灵集》、《国秀集》俱作夜。”按盛唐时殷璠所编之《河岳英灵集》，有宋刊本、明清刊本多种（详后），但此句“薄暮”之“暮”皆作“雾”，无异字，并未有作“夜”者，《校笺》所谓作“夜”，毫无根据。又同为天宝时芮挺章编选之《国秀集》，共三卷，其卷中载李崧诗二首：《读前汉外戚传》、《游侠》，《游侠》即《纪事》之《少年行》（《文苑英华》卷一九四同）。但《国秀集》所载此诗，仅“玉剑膝旁横”一首，即《纪事》之《少年行》第三首，《校笺》提出《国秀集》所载文字有异者为《少年行》第二首，而此第二首则为《国秀集》所未收。《校笺》如此出校，所引《河岳英灵集》、《国秀集》二书，皆无根据，甚为疏忽。

今就唐人选唐诗代表性著作《河岳英灵集》、《篋中集》、《中兴间气集》、《极玄集》，择要列举如下。

《纪事》卷二四载王昌龄《长信秋词》，《校笺》谓此诗题，《河岳英灵集》作“长信宫”，即无“秋”字。按《河岳英灵集》为殷璠于玄宗天宝后期所编，其自叙谓收诗二百三十四首，“分为上下卷”，即两卷。国家图书馆藏有此书两种宋刊本，皆为两卷，当最接近原书。而后通行的几种明刊本皆为三卷。著名藏书家、校刻家傅增湘在其《藏园群书题记》中曾特为指出，《河岳英灵集》之宋本与明本相校，字句差异极多，“盖自明代翻刻以后，沿讹袭误，已匪一日矣”。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58年编印的《唐人选唐诗（十种）》，即据毛氏汲古阁明刻本（详参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校笺》所谓《河岳英灵集》作“长信宫”，经核，宋刊本仍作“长信秋”，与《纪事》原文同。明崇祯元年毛晋汲古阁刻《唐人选唐诗》八种，其中《河岳英灵集》有何焯（义门）批校，何校于此诗题亦作“长信秋”，即亦据宋本者。

类似者，如《纪事》同卷载殷璠评王昌龄诗，举其诗数句，其中“昏为蛟龙怒，清见云雨入”，《校笺》则谓《河岳英灵集》，“怒”作“窟”，“清”作“时”。经核，宋刊本未有此异文，与《纪事》原文同。又如卷一五，《纪事》载王湾《晚夏马嵬卿池亭即事寄京中二三知己》，《校笺》则谓《河岳英灵集》题作《晚夏马嵬卿叔池亭即事寄京都一二知己》，与此异。实则宋刊本亦与《纪事》原文同。《校笺》所据《河岳英灵集》，即据上海古籍出版社选辑之明汲古阁刻本，未知国家图书馆尚藏

有宋本。其他类似情况者多有，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以下如《篋中集》等亦如此。

中唐时元结所编的《篋中集》，也有好几种版本，较早为清徐乃昌覆刻之影宋抄本（《徐氏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之《唐人选唐诗（十种）》，其中《篋中集》即据此排印。另有几种明刻本，亦各有特色，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所藏者，有冯舒、黄丕烈校并跋的明刻本，缪荃孙校并跋的明刻本，郑振铎藏明刻本《唐人选唐诗》六种，汲古阁刻本（有何焯校）。徐氏校印之影宋抄本，虽时代较早，但徐氏校文缺漏疏失甚多，傅璇琮之《唐人选唐诗新编》即据有好几例（见《篋中集》前记）。如《纪事》卷二二沈千运条，载有元结《篋中集序》，云所选诸人“皆以仁让而至丧亡”，《校笺》乃谓“仁让”原作“仁谦”，今据《篋中集》改。按徐乃昌《徐氏丛书》本确作“仁让”，但何焯所校之汲古阁旧抄本作“仁谦”。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一九记《篋中集》，谓何焯跋中称曾于康熙年间从汲古阁得见一旧抄本，虽为明抄，其所据为南宋本。可见《篋中集》即有好几种版本，不能仅据其中之一即改文。

又《纪事》卷二三载张彪《北游还酬孟云卿》，此诗题，《校笺》谓“还”原作“远”，据《篋中集》改。按冯舒校评本、郑振铎藏明刻本皆作“远”，王安石《唐百家诗选》所录亦作“远”，则应作为异文校，不能仅引一种版本即据改。另，《校笺》也有漏校者，如《纪事》卷二六载王季友《寄韦子春》诗，首二句“出山秋云曙，山水已再春”，“山水”一词，《篋中集》作“山木”，《河岳英灵集》作“山色”，“山木”与“山色”均较切合诗意，而《校笺》则未校及。

又《纪事》卷二一载李嘉祐《润州阳别驾送张侍御收兵归扬州》诗，《校笺》谓《中兴间气集》，“阳”作“王”。按中唐时高仲武所编之《中兴间气集》，现存最早者为国家图书馆所藏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其他为明万历刻本、明嘉靖刻本、汲古阁刻《唐人选唐诗》本（详参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之《中兴间气集》前记）。上海古籍出版社之《唐人选唐诗（十种）》，其《中兴间气集》即用明嘉靖刊本（即《四部丛刊初编》本）。汲古阁影宋抄本于李嘉祐此诗题，仍作“阳别驾”，未作“王别驾”。《校笺》当即引用上海古籍出版社本，未注意有影宋抄本。影宋抄本不仅时代早，而且所载高仲武对所选诗人之评语，明刻本多有缺漏；所载之诗，影宋抄本是而嘉靖本、万历本误者亦有好几处，《校笺》也多

未涉及。如《中兴间气集》卷下李秀兰，高仲武评语颇长，中有记述李秀兰与诗人刘长卿相讥谑一段，云：“尝与诸贤集乌程县开元寺，知河间刘长卿有阴重之疾，乃诮之曰：‘山气日夕佳。’长卿对曰：‘众鸟欣有托。’举座大笑，论者两美之。”按此一段，影宋抄本有，唯嘉靖本、汲古阁本无。《纪事》卷七八李秀兰条引有高仲武评语，但亦无此一段，《校笺》则仅引《太平广记》卷二七三补之。可见其未曾见引影宋抄本，仅据《太平广记》转引。

又《纪事》卷二五张继条，记张继事，有举其《送郗绍充河南租庸判官》诗，《校笺》谓：“诗题《中兴间气集》作《送判官往陈留》。何焯校本‘送’下有‘邹’字，误。”实则《中兴间气集》影宋抄本于“送”下即有“邹”字，实不误，《纪事》以“邹”作“郗”，却误。与张继同时之诗人刘长卿有《毗陵送邹绍先赴河南充判官》诗（《刘随州集》卷五），《全唐诗》卷二四二所载张继此诗，亦作“邹绍先”。按《元和姓纂》卷四邹姓，记有：“开元中有象先、绍先、彦先。”《纪事》之卷二二即有邹象先条。绍先当为象先之弟。^①由此可证《纪事》所载张继诗，诗题之“郗”字误，并于“郗绍”下缺“先”字，《校笺》皆未校及，有疏忽。

《纪事》卷四三于良史条，有引高仲武评，中云“良史工于清雅”，《校笺》谓《中兴间气集》作“良史诗清雅”，乃据改。按影宋抄本此句作“侍御诗体清雅”，未直称其名，称其官衔。按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三于良史传，记其“至德中仕为侍御史”，当有所据，与影宋抄本之《中兴间气集》合。《校笺》所引，仅提及“良史”名，则未见及影宋抄本及《唐才子传》，又为疏失。

又，《纪事》卷二六苏涣条，载其《变律诗》，首四句为：“日月东西行，照在大荒北。其中有烛龙，灵怪人莫测。”《校笺》有校，谓《中兴间气集》载此诗，首句同，其下三句为：“寒暑冬夏易。阴阳无停机，造化渺莫测。”按此三句为明刻本《中兴间气集》，影宋抄本则大致与《纪事》所载同，唯“照在”作“不照”，“烛龙”作“毒龙”。《校笺》所引《中兴间气集》，误校、失校不少，确需普查，逐一核正。

^① 参见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张继考》，中华书局1980年版；又《唐才子传校笺》卷三周义敢笺之《张继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

《校笺》中引及《极玄集》，又有漠视现代研究成果事。按中晚唐际姚合所编之《极玄集》，一般为明以后的通行二卷本，所收二十一人诗，各人名下多有小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谓：“总集之兼具小传，实自此始，亦足以资考证也。”于所收作者名下撰有小传，《极玄集》如此作，被认为是总集体例的一大开创。过去论及中唐及大历诗人，也多引以为据。但《极玄集》今存最早者为上海图书馆所藏的影宋抄本（一卷本），此影宋抄本于所收诗人名下皆无事迹记载，今存南宋以前文献，也未有引录或提及《极玄集》小传者。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曾于此影宋抄本有所考，谓此小传非姚合所撰，而是明人在将该书析为二卷时，又采掇通行所见的材料，剪辑而成^①，非姚合原著（又见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之《极玄集》前记）。这已成为唐代文学研究通识。但《校笺》却往往引《极玄集》通行本所载作为诗人事迹补正。如《纪事》卷二六刘长卿条，《校笺》谓《极玄集》载长卿“开元二十一年进士”。实则影宋抄本未有此记述。又据当代有关刘长卿事迹研究，刘长卿于玄宗天宝六载前尚未进士登第，其及第当在天宝后期（参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刘长卿事迹考述》、陈尚君《唐才子传校笺补笺》、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卷二七）。则所谓刘长卿于开元二十一年进士，不合事实。

《校笺》在文字校勘时，也仅引明刻本，如《纪事》卷二〇祖咏《兰峰赠张九皋》诗，“孤山出幔城”、“长怀魏阙情”句，《校笺》谓“幔城”原作“草城”，“魏阙”原作“魏国”，据《极玄集》等改。按此乃据明汲古阁本（即上海古籍出版社之排校本），上海图书馆所藏影宋抄本则皆作“草”、“国”，即应作异文校，不能径改，应保存原貌。另《校笺》又有失校者，如《纪事》卷二〇载祖咏《夕次圃田店》诗，末句“中夜渡泾水”。按此诗较早即见于《极玄集》，此句之“泾水”，明汲古阁本《极玄集》及清《全唐诗》（卷一三一）同，而影宋抄本、《文苑英华》（卷二九二）及郑振铎藏明刻本《唐人选唐诗》六种，均作“京水”，何焯（义门）有校，云：“京，京索间也。泾字缪甚。”可见《校笺》于此失校。

^① 参见陈尚君《唐才子传校笺补笺》之《姚合传》，中华书局1995年版。

圣代复元古 大雅振新声

——李白《古风》（其一）再解读

薛天纬

《古风》其一（大雅久不作）是李白最重要的诗篇之一，是李白以诗的形式写成的诗歌演变史，表达了李白的诗歌发展观，并宣言了在大唐盛世以振兴诗歌为己任的宏伟抱负，即裴斐先生所说：“这是一首论诗诗，又是一首言志诗。”^①关于此诗立论的要旨，自南宋杨齐贤以来，注家及论者形成了基本的共识，认为李白的核心观点是复古，以“大雅”为诗歌的最高境界，由此而下，一代不如一代，直至“圣代”始迎来文运的肇兴。^②“复古”之说固然不错，但若认为李白心目中唐代之前的诗歌演变史呈一线直下之势而无任何起伏，则未必符合诗人本意。而且，对诗中

① 裴斐：《李白与历史人物》，载《文学遗产》1990年第3期。

② 注家的观点，以杨齐贤为代表，曰：“《诗·大雅》凡三十六篇。《诗序》云：‘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大雅不作，则斯文衰矣。平王东迁，《黍离》降于《国风》，终春秋之世，不能复振。战国迭兴，王道榛塞，干戈相侵，以迄于祖龙。风俗薄，人心浇，中正之声，日远日微，一变而为《离骚》。《史记》曰：‘《离骚》之作，盖自怨生也。’（纬按，‘《史记》曰’三句不见于元刊萧注本，而是郭云鹏删节本文字，然概括《离骚》特点，胜于萧注。萧注原文略）屈平之后，司马相如、扬雄激扬其颓波，疏导其下流，使遂因肆，注乎无穷。而世降愈下，宪章乖离。建安诸子，夸尚绮靡，摘章绣句，竞为新奇，而雄建之气，由此萎荏。至于唐，八代极矣。扫魏晋之陋，起骚人之废，太白盖以自任矣。”（萧士赉《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卷二引）萧氏转引了杨齐贤的注释，表明持赞同态度。王琦注也转引这段话，仅对“吾衰”句提出不同的解释，表明在总体上也赞同杨注。论者的观点，可举赵翼《瓠北诗话》的说法为代表：“青莲一生本领，即在五十九首古风之第一首，开口便说：大雅不作，骚人斯起，然词多哀怨，已非正声；至扬、马益流宕；建安以后，更绮丽不足为法；迨有唐文运肇兴，而已适当其时，将以删述继获麟之后。是其眼光所注，早已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直欲于千载后上接风雅。”